

10.09



92

# 红 烛 颂

(南通县名教师专辑)

南通县文史资料第九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南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2年11月

# 序

现在，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是一本歌颂南通县教育战线上作过杰出贡献、有声望的名教师专辑——《红烛颂》。

名人之所以有名，那是由于他们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劳动代价，走过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历程，为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人，理当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我们南通，张謇公首开现代文明教育之先河，在1902年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此后，献身于教育事业的人才辈出。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下，付梓问世《红烛颂》一书，辑录30余篇史料，表达了对传主的追忆和怀念。这30多人中，有中小学校、师范学校的创建人，也有学校的校长，还有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有致力于师范教育的先贤，也有普通教育的名师，还有塾师、幼儿教师和成人教育工作者；有语文、数学教师，也有音乐、体育、图画老师，还有默默奉献的教务工作者和教师世家的四代从教者……他们，都是在教育战线的不同岗位上殚精竭虑、耗尽心血，为我县和国家培养精英作了杰出贡献、声誉极高的园丁，是全县人民所认可的名教师；他们，就象一支支巨型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今天，为他们树碑立传，歌颂他们的奉献精神，形象栩栩，生动感人，给人启迪，催人奋发，值得一读。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和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都与教师工作有着密切关系。振兴中华，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希望在教

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南通县经济要振兴，首先要振兴科学技术。而科技人材的培养，关键是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红烛颂》中的诸多教育界先辈，已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作出了楷模；我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定会比前人做得更好、贡献更大。在南通县实现奔小康、建成苏北首富县的宏伟目标中，如果该书能对奋战在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的人们、特别是教育战线上正在辛勤耕耘的人们有所激励和促进的话，这正是我由衷的心愿。

此书编者嘱我为序，我乐而为之，以此表达我的衷心祝愿。是为序。

卫树人

1992年10月

# 目 录

序	.....	卫树人
于敬之先生传略	.....	丁超一( 1 )
忆于校长	.....	陈象新( 5 )
顾怡生先生传略	.....	陆文蔚( 11 )
缅怀教育家顾怡生先生	.....	及门弟子 琰( 15 )
张梅安先生传略	.....	夏企贤 撰写 曹振东 审订( 18 )
永远缅怀梅安老师	.....	马 翱( 26 )
闻名中外的南通籍数学家、名教师崔朝庆	.....	陆伯生( 29 )
甘作塾师的穷秀才	.....	
——祖父任焕文琐记	.....	任科家( 33 )
不吝私资不忘公	.....	
——记孙儆为兴办金沙教育等事业所作的 努力	.....	姜光新( 37 )
四代从教的曹品珊老师一家	.....	卑宗淦( 41 )
一生献身教学的方仲谋先生	.....	吴周翔( 46 )
终生难忘的邵硕民老师	.....	朱章民( 50 )
缅怀私立重三中学创始人陆重三先生	.....	陆维城( 54 )
善育桃李的“东篱花神”	.....	
——记图画老师张彝	.....	陆牟机( 59 )
学门今敞开 凤愿幸已偿	.....	
——深切怀念贫寒学生的慈父朱敬亭恩师	.....	邱明樵( 63 )

忆徐立孙先生	陆文蔚	( 69 )
热心于地方教育事业的吴浦云先生	陆牟机	( 71 )
成人教育工作前辈沙仰三先生	张国华	( 76 )
回忆敬爱的胡履之先生	朱德祥	( 81 )
忆先师李伯平先生	丁宪周	( 85 )
名师唐雪蕉	陆文蔚	( 90 )
我所认识的刘子美先生	陆文蔚	( 93 )
忆一代名师奚子美先生	邱明樵	( 96 )
〔附〕我们记忆中的奚子美老师	叶文华 沈慧鸾	( 100 )
众口交誉的学校“管家”侯村林	陈蓓蓓	( 102 )
怀念私立重三中学校长陆维恭先生	陆维城	( 106 )
致力于乡村教育的陆见齐	陈蓓蓓	( 111 )
学校总务工作的楷模		
——记张一冰先生	朱约言 张其才	( 117 )
回忆吴鸣镛老师	陈汉中	( 122 )
史友兰生平述略	陆文蔚	( 129 )
我的父亲李也止	李培安	( 133 )
怀念宓老	余学广	( 138 )
回忆丁然哉先生	丁郁哉	( 145 )
历尽艰险 坚持办学		
——缅怀樊伯平老师	茅慎之	( 151 )
忆伴侣、劳模秦德智同志	杨松泉	( 156 )
体育名师李恒祺	徐庠德 高志华	( 161 )
附录		( 166 )
后记		( 168 )

# 于敬之先生传略

丁超一

于敬之先生名忱，清光绪三年（1877年）7月6日诞生于南通县骑岸镇。幼年在学塾读书。年长，参加童试，复经岁考，成绩卓越，补为贡生。因受到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乃于1903年就读于张謇创建的民立通州师范学校。1906年5月毕业，成绩优异，为张謇所赏识。1907年2月，被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于1909年12月学成回国，翌年1月供职于母校。这时，母校由民立改为私立通州师范，后又改为私立张謇中学。先生曾担任庶务主任、事务主任及校务委员会主任。先生为人以身作则，刚正不阿。教育思想以爱国民主、尊师重教、坚持民族气节为主。工作认真细致，勤恳踏实。生活艰苦朴素，自奉节俭。事无巨细，均管理得头头是道。且亲近学生，善于言谈，以理服人，所以颇为师生所称道和敬重。先生胸怀坦荡，平时言谈中，对清王朝极为不满。尝谓：“豚尾在领，马蹄在袖，如此领袖，岂能持久？”倾向民主进步，反对封建专制，情溢于辞。1911年，先生兼任通州教育会的总董，以后还历任南通公署第三科科长、南通县劝学所所长等职。在职期间，他曾积极响应张謇先生的倡议，致力于全县境内每十六方里筹办一所初等小学堂。各地民众对此表示赞成和支持，并分别付诸实施，为普及基础教育事业，起了奠基的作用。母校第二任校长江谦在任职期间，很少到校，实际是于先生负责主持校务。先生对个别同事出现越轨行为，能直言不讳，敲起警钟。1924年8月～1927年7月间，先生任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即今南通中

学）校长。1912年11月，母校改称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1921年，改为第一代用师范；1927年7月，母校取消代用；1928年8月～1929年7月，改为私立张謇中学，分为初中部和高中师范科，学制各是三年，由马心斋担任校长职务。1927年，母校与海门县教育局曾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海复镇学田纠纷，这是一件关系到学校经费的大事。先生先后大约花了二年多的时间处理这件讼事。因先生据理力争，终于获得审判机关的公正裁决：通师以五分之四胜诉，藉以维护学田的权益。这事表现了先生为维护学校权益，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决心。1929年8月～1935年11月由张孝若任第四任校长。张校长常住上海，不到校视事。先生则名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实则代理校长职务；同时还兼通海垦牧公司董事会职务。在这期间，正是学校经费短缺，陷于困境的时期。先生经常奔波于通沪、通启之间，不辞辛苦，不怕周折，筹措学校教育经费，使学校困难稍获缓解，得以维持下去。张孝若校长逝世后，他校校董会正式委任为校长。母校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学校受进步思潮影响，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十分活跃。而先生对当时政府的腐败，也有过激之言。先生曾于省民教馆开馆典礼上公开指出：“要做到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钱……”充分流露出对当时现实不满情绪。根据彼时社会背景，能在大庭广众之中，道出如斯语言，实非一般人敢说肯说的，这也充分表明了先生的胸怀与胆魄。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学校仍坚持上课。1938年3月17日，日寇侵占南通城。母校原来的500多间校舍，全部图书、仪器和用具等，一日之间，破坏殆尽，留下的仅三株银杏树和一对石狮。1938年6月，先生与顾怡生、尤慎铭、曹勋阁、曹风南、王绍羲、胡履之等毅然借海复镇二附校舍作为校舍复课，发扬通师优良传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为国家培养抗战人材。新四军东进以后，先生拥护中共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

爱国民主教育。此时，与上海校董会仍保持联系。1942年母校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先生等邀约苏中第四行政区专员季方和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来校参加东南行署所属海门中学等部分师生共同举办的青年联欢会，部队首长和先生讲了话。会后还进行了作文、数学、演讲、歌咏等比赛活动。比赛结束，粟师长亲自为获奖者发了奖品。通过联欢交流，传播了抗日民主思想，广大师生受到极大鼓舞和深刻教育。我党政军首长对先生等领导全体师生不畏强暴，坚持敌后抗日民主教育的精神，尤表钦敬。1944年7月，正是敌伪疯狂“清乡”、“扫荡”时期，苏中行政公署在高邮乡下召开文教工作会议，会上表彰了教育系统著名的“苏中八老”，先生和顾怡生先生以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卓有成绩，均被列为八老之列。1945年8月，日寇已经宣布投降，先生应校董会邀约去上海，筹备在原校址复校事宜。事后由于先生不断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反复申言，以复兴地方教育事业为重，除已争取到复校物资500箱棉纱外，还经董事长张敬礼先生从大生一厂拨出1000箱棉纱的额外赞助，不足之数由先生在沪劝募解决，是以母校于1947年2月得以动工兴建，同年9月竣工，其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此实为先生办事明快果敢之效。从此，雄伟的新校舍，又屹立于三元桥畔。1947年下半年便将1946年在通师一附招收的一班师范生迁来新校舍上课，同时又新招了两班。回顾母校在近90个不平凡的春秋里，几经历史风雨，迭遭艰难曲折，而始终弦歌不辍，为国培英育才，先生在其中是费尽了心血的。

1946年，国民党政府阳饰民主，阴谋戡乱，聘先生与顾怡生先生为县参议员，劝驾者络绎登门，先生再三婉辞不果，乃与顾先生联名严拒，矢志“为教”不“为政”，其声明刊于当年南通各报。

1949年2月，南通市解放，先生继续任母校校长，并另请张梅安先生任副校长，协理校务。1950年6月后，一再被选为

人民代表，参加1~3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直到1952年夏为止。1952年初，学校呈准苏北行署文教处由私立改为公立。从1952年夏起，先生在家养病至1956年10月30日因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0岁。这是南通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南通市委、市政府为先生举行了追悼会，遗体安葬于南通城西北猫儿桥公墓。后因该区另有建设安排，1985年5月迁葬到城北郭犁头公墓。

先生的一生是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的一生，特别是致力于师范教育的一生，是苦干实干的一生，更是为事业执着不懈的一生。他在40余年的岁月里，确确实实以自己的全部精力，无私奉献给了师范教育事业。

# 忆于校长

陈象新

我是1939年暑假，母校通州师范第三十二届的毕业生。离开母校已经50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们的老校长于敬之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激励着我前进。于校长是虔诚的爱国者，忠诚的教育家。在他老人家身上，比较充分地体现着母校“艰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精神。我在母校读书的6年时间里，常常聆听校长的教诲，有许多至今印象仍很深。

于校长对我们讲“艰苦”，说“坚是心志不移，苦是刻苦耐劳”，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为着教育事业勤学苦练。他多次引用了古人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名言教育我们。母校通师历经艰难曲折，于校长身体力行，把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奉献于师范教育事业。他抱着“民智兮国牢”的宗旨，数十年来始终使学校弦歌不辍。当时在困难中挣扎的许多师长也艰苦自律，顾怡生老师有诗比之为“共抱岁寒心”的松柏。于校长的生活，同样非常艰苦朴素。除了节日或外出应酬外，平时总是穿着布衣布鞋，常常与学生一起吃饭。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同学吃煮老蚕豆时吐出豆皮。老校长看见了，就走了过去捡起吐在桌上的豆皮一口吞下肚去，说：“这是可以吃的，这是农民流了许多汗水种出来的啊！连皮吃，营养更好。”随时随地，他言传身教，教育我们坚定不移，艰苦朴素。

于校长教我们“自立”，要我们从学校中起就培养自立的

意志，养成自立的习惯，学会自立的本领。要自己动手，不依赖别人。当时国民党腐败，社会黑暗。于校长常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同流合污，不要让坏风气沾染，要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情操。社会上，有些人崇洋媚外，恐外心理很严重。于校长反复教育我们要有自尊心、自信心。洋人不可赖，洋货不可取。救亡图存，主要是靠我们自己。他常说，创校人张謇公就是靠自己办实业、办教育，以期达到民富国强、民智国牢的目的的。

他教我们“忠实”，说忠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金瓯破碎，国土沦丧，他说：“我们要努力救亡。国难当头，只有奋起。即使国家亡了，也要亡后图存，决不能甘心当亡国奴，更不可当汉奸。”他经常讲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事迹教育我们。他很赞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见解，说：“对于国家民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不遗余力。”抗战前，把帝国主义侵略丧权辱国的日子定为“国耻纪念日”，每逢“五·九”等，他在校时都要对我们全体学生讲话。曾多次说过：“雪耻在于行动”，“知耻近乎勇”，“耻而不知雪，其可为人乎？”记得我们在校时，“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爆发，南通市大中学生积极响应。一天，我们全校师生坐在礼堂的长凳上集会，于校长正在讲话。忽然南通农大的学生代表走进礼堂，说明来意，要求发言。于校长当即同意。当代表高声说到“今天，我们全市学生举行游行请愿，赞成的起立”的时候，大家都霍地站了起来。于校长马上就宣布到操场集中，他自己也亲自参加了游行的行列。而同在南通城内相距不远的南通中学的校长，却百般阻挠，不让学生出来，甚至把校门也关闭了。1938年，南通沦陷前，城里许多人都走了，有的学校也已迁走了，而于校长能坚持上到“最后一课”。直至3月17日凌晨，日本鬼子进入城里，于校长才和我们学生一起离开学校。

随后又积极着手在海复镇东第二附小复课，称为“侨校”。在日本鬼子残酷地“清乡”“扫荡”时，侨校不能集中上课，就以“学塾”的形式，分散坚持办学。他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也不赞成口头上空喊“抗日”。他看到了群众中的抗日热情，在给我班毕业纪念册题词时写道：“前事不忘后事师，多士都呈勇武姿。谈兵纸上终何补，大厦还须实力支。”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我护送一个重病同学到离校30多里的我家以后，立即回校，校长正在疏散学校的图书。我要去帮助，他生气地制止了我，厉声说：“你们平时抗战、抗战喊得那么响，敌人一来，却置学校于不顾，跑得无影无踪，你还来干什么？”这几句话使我呆呆地怔住了。我是一个在校学生，在紧急情况下没有首先想到学校和老师，确实很内疚，慢慢地我告诉了校长离校的原因，又谴责了自己。校长这才瞪了我一下说：“情有可原。”让我和他一起，伛着身子，抬了箩筐，送图书到校门口车上去。这时，枪声已清晰可闻。还有一事：我们毕业的时候，学校隆重欢送。于校长激昂慷慨地即席发言，要我们坚持抗战，坚信胜利，好好从事教育工作。我们情不自禁地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并向校长又一次敬了酒。这掌声，似乎至今仍在耳边回响。

于校长讲“忠”，尤其突出在忠于教育事业上。他自己对母校通师，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一丝不苟，是忠诚的教育家。每当我在教育工作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想起母校的校训与校长的教导，不畏难，不退却。从毕业到离休前几个月，40多年，坚持教育岗位，不敢懈怠。于校长重视“守信”，不轻易许诺，但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他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人谋而不忠，言而无信，其可为人乎？”1935年12月12日夜晚，我们师一的10个同学，突然被国民党县党部叫去，强迫我们参加国民党的“C·C”特务组织。我们十分反感，但又无力反抗，就秘密推举一个同学赶回学校，请于校

长营救。于校长立即打电话到国民党县党部。接电话的人支支吾吾，于校长斩钉截铁地说：“让他们回来，立即回来，一个不能留，一分钟不能等。”我们这才避免了一场掉进泥坑的灾难。在那特务统治的年代里，于校长奋身营救我们，这是何等刚毅！

讲“实”，于校长说就是注重实际。要求真诚，而不是虚假，要求认真干，而不是说空话；要求“掘井求泉”，而不是“为山九仞”。因此，每个人本身就要打下扎实的基础。校长他老人家身体力行，一生苦干实干，如在学校中，每天都要到处巡视，始终如一，实在不容易。

于校长年轻时曾游学日本，有民主思想。他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多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抨击。也不满于国民党打内战，祸国殃民。他赞扬新四军的纪律、作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抗战时期，不畏强暴，不顾艰险，坚持根据地抗日民主教育；并为通海垦牧公司带头接受“二五减租”、拥护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支持群众抗日战争。南通市解放以后，仍续掌通师校务，为新中国培养人材，又被推选为市人民代表，参加南通市一至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为民主建设献计献策。他是虔诚的爱国者。今天我们回忆和纪念于校长的时候，深切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繁荣富强。校训的“忠实”，就应当领会为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教育工作者，就该集中地体现在忠于日常所从事的教育事业。

至于“不欺”，于校长主要教导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要真正有中国人的样子，中国人的风度、气魄。要实事求是。该是就是，该非则非。不要蒙混含糊，不要弄虚作假。要敢于表明自己的立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欺骗自己，也不受欺骗。不以一己之私利，而自欺欺人，以辱人格、国格。还要不欺侮别人，依理处事，以礼待人。于校长料理理事，都很明

快，合情合理，干净利落。也敢于直言，敢于批评。可以说对学校中每一件事，都要求严格，毫不马虎。如有谁侵犯学校利益，就据理力争，直至胜利。老教导主任顾怡生先生比较谦和。主要负责学校工作的二老，我们看成是一个严父，一个慈母。于校长的严，固然体现了“不欺”的精神；而怡师的慈，也是“不欺”精神的一种表现。他们两人有分工，于校长主要对外，怡师主要对内。相互配合，相互尊重，不同意见，也相互争论，谁的意见合理，就服从谁。如在侨校招生问题上，按照传统是男女分校，随着形势的发展，怡师主张男女同样看待，同时招收。经过论争，于校长同意了怡师的意见。又如女生在校能不能穿短袖、短裙，校长也尊重了怡师的看法。他们两人在有些重大问题上，有时争论得很激烈，甚至面红耳赤，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依然相互尊重，从不耿耿于怀。于校长在大会上讲话，往往严肃批评，不管是谁。有一次我听到他驳斥了他人所谓“理由”以后，慨叹地说：“余岂好辩也哉，余不得已也。”他借用古人话，表明他并非为辩论而辩论，只是为了维护真理，维护学校利益。对于学生也严格要求。我在母校读书时，曾被于校长严肃批评过两次——都在侨校。除反“扫荡”那次外，还有一次。那时我当膳食委员会主席，师生伙食都由我们5个学生代表组成的膳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由于我“兼而未管”，加上在战争环境中物资供应困难，入膳同学有不少意见。我召开了各班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于校长也亲自列席，并在将结束时讲了话。我接着说：“校长的讲话很深刻，我们要好好领会。在伙食问题上，确实同学有同学的苦衷，校方有校方的难处。我们要尽可能改善伙食，还有不足之处，要请校方支持，同学们谅解。”于校长听了，当场就大声说：“校方、校方，还有学生方么。你是哪一方？你是‘鲁仲连’？还说什么‘深刻’！”我汗流浃背，满面通红，至今还记得。“不欺”，就是要正直，不能模棱两可，推三诿四，这一方、那一方地含

含糊糊，把自己置身事外。

我在母校6年，受到于校长的教育熏陶，我很敬爱于校长。1944年暑假，我作为二分区的师范敬育代表出席苏中教育会议。当会上举行隆重仪式，宣布苏中区党委与苏中行政公署的决定，表彰母校于校长与怡师等同为“坚持抗日民主教育有特殊贡献”的“苏中八老”、并授予嘉奖令及证书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校长与怡师因为年老请假未能参加会议。我们到会的来自苏中各地的校友27人，立即集会祝贺，并推举当时任四分区敬育处科长的李也止老师执笔写致敬信，大家签名，委托四分区代表中的校友，将致敬信连同嘉奖令与证书返回后一起转呈。致敬信中还表明了我们决心以于、顾二师坚持抗日民主教育，忠诚敬育事业的精神，激励自己，决不辜负母校老师们呕心沥血的教育之恩。

我与于校长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南通解放以后。那时，我参加南通地区教育会议，回到母校拜见老师。在新校舍的礼堂里，见到于校长。他正扶着拐杖，独自在悬挂着创校人张謇先生手书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八字校训的匾额下仰望。我走上前叫了一声“校长！”行了礼，垂手站在一旁。于校长侧过头来看了看我说：“你是陈匠心吗？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校长！是的。我现在海门中学。以前，在侨校原址的东南中学。”他听了后点点头。接着他又回过头仰望起校训匾额来。我也随着注视校训匾额，不禁思绪万千。此后，我们再也没有相见，这次会面竟成了永诀。于校长去世30多年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 顾怡生先生传略

陆文蔚

顾公毅（1881～1955年），字怡生，清末秀才。1902年，张謇创办私立通州师范学校，先生毅然舍弃科举仕途而投考，为师范本科第一届学生；1906年毕业，以学业优异，为校长张謇所赏识，留校任教。师范创办之初，因有些课程我国国内无人能够担任，张謇先后延聘日本籍教师7人，担任日文、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等课程，先生专心致志学好这些功课，取得优异成绩。留校以后，益发勤奋攻读日文，在日籍教师陆续辞退以后，先生就主讲论理学等课程，并着手翻译此类教材和书籍，于1911年编译《论理学》教本（中华书局出版），又于1915年编著师范教本《心理学》（中华书局出版，今存北京图书馆），填补了这类课程任教无人和教材缺乏的空白。先生以学识丰富，教学认真，工作勤恳为同辈和学生所敬重。留校不久，张謇就委以教务主任之职（后改称教导主任），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止，时近40年。先生善诗、古文辞，有文名。在民国初年，与徐益修、曹勋阁、顾观予合称为“通州四才子”。其诗文写作甚富，于抗日战争前，多刊于南通各报的文艺副刊上。先生在教育方面亦多所论著，曾在《通师校友会》杂志上发表多篇教育论文，80年前，就论及师范教育的哲学，和著论提倡儿童学，具有教育家的远见卓识。20年代，《东方杂志》曾举办教育征文，先生著文应征，获一等奖第一名。在主持通师教务时，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十分关心爱护，言传身教，处处示人以范，因此，通师历届毕业生都对先